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五)



人民出版社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Астахова М. С., Горская Г. В., Данилов В.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 号

责任编辑:王一禾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臧乐安 译
王钢华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879-4

I. 新… II. ①雅… ②臧… ③王…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377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臧乐安 译 王钢华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0.75

字数:91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879-4 定价:11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879-4



9 787010 068794 >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臧乐安 译 王钢华 校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人 民 出 版 社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 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 葵	黄书元	鲁 桓	戴秉国
魏 华	臧乐安				

序

1929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1929 年 4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政治上摧毁了 А. И. 李可夫、Н. И. 布哈林、М. П. 托姆斯基集团及其支持者(有关材料发表在本书的上一卷,第四卷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对政治局中斯大林多数派的束缚,使其得以放手施展。在 1929 年 4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五年计划的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 1.8 倍,而第一部类增加 2.3 倍¹。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1929 年 6 月至 11 月期间,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大大提高了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其中包括森林工业、有色冶金、机器制造、黑色冶金、化学工业,等等。除了 4 月通过的五年计划规定建设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之外,又规定在 1931—1932 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和哈尔科夫再建成两个新的拖拉机厂。车里雅宾斯克厂的年产量为 4 万台,它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拖拉机的企业。1932—1933 年拖拉机生产计划被扩大到 20.6 万台,而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批准的五年计划方案则规定为 5.5 万台。生铁和钢的生产任务在 1929 年 4 月至 12 月间较五年计划增加了 40% 以上²。全国都广泛地宣传“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

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绝对优先方向,而这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这里说的不仅是要用出口谷物从西方购进工业设备,而且也包括要保证日益扩大的工业工人大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

农村中“紧急”收购粮食的新浪潮把 1929 年最初几个月的第一次浪潮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对“右倾分子”政治清算之前,中央有关机关的指示和通令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同经常提醒要遵守“革命法制”,对贫农和中农阶层“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联系在一起

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早在3月末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就已经开始试行粮食收购的新办法,这种新办法又恢复了向农村以及农户摊派“硬性的计划任务”。

5月初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5、6、7月,也就是说在新的收成之前,收购5500万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的决议,“作为必须完成的最低任务”³。早在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之前,А. И. 米高扬就通过直线电话通知地方:第一,提前通报说,5月7日他将下达每个区的任务;第二,指示要立即采取“在把计划任务通知到村并动员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基础上完成粮食收购的办法”。详细说明了应该如何行动:自上而下地下达“每个(!)村任务的准确份额”(如同战争年代实行的余粮征集制做法一样);“在村民大会通过……每村的粮食收购计划”之后由这个村民大会选举的贫农和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而且“首先要从所有的农民中挑出上层富农,给他们规定交售一定数量粮食的义务以完成全村的计划。粮食的余额部分再在其他农民中分配”。没有完成应交义务义务的农户“应该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⁴。从与这个指示有关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地方上马上就规定了“不经法庭审理,而用行政手段处以罚款的办法”,在拒绝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处以五倍的罚款”。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专门决议,认为“规定把粮食收购计划任务分配到每个村镇的办法是适宜的”,并批准了政治局一个委员会制定的具体决定,就在同一天,这些决定被列入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扩大地方苏维埃权限以促进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和计划”的决议之中。从这一刻起用行政办法处以罚款,以及罚款数额“为规定的赋役或任务”五倍的规定就成了法律。而且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⁵。

采用新的镇压手段的做法,在农民中被称为“加倍惩罚”,开创了一个由使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107条起始的剥夺富农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消灭被列为富农的农户具有了公开的、彻底的性质,因为在一次性任务对他们已经是不胜负荷的情况下,哪一个农户能经得起没收五倍的财产呢。剥夺富农历史中的下一步——过渡到没有任何原因和理由地消灭被划定为富农的农户,这一步很快就在1930年1、2月份到来了。

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是同时进行的,到1929年五六月间已经成了对农民实行国家暴力的主要方向。没收粮食储备往往也没收生产工具,过去曾经被认为

是地方当局的“过火行为和歪曲”，从实行“加倍惩罚”开始则成了行为准则，甚至是官方政策所直接要求的。当抱怨浪潮达到了不能不引起注意的规模时，政治局在1929年11月5日，也就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前夕，通过的《关于粮食收购的进程的决定》中委托卡冈诺维奇和瑟尔佐夫“起草就个别具体事件给个别地区的信件草案”，并且没有指定上呈信件草案的期限⁶，而当时在（对斯大林领导层）重要的情况下，规定的期限有时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的。

从1929年收成中收购粮食计划期限的缩短，在极大程度上加剧了对农民粗暴施加压力和扩大镇压措施的局势。最初向地方组织提出的要求是在1月份“保证完成全部计划”（个别情况下可以延迟到2月底），可是到了10月底由斯大林签署的中央特别指示指定了更短更准确的期限——1929年12月1日⁷。为此目的，从州和边疆区一级“负责工作人员”中派出的和一部分直接从中央机构派出的粮食收购特派员数量迅速增加。这些特派员，第一，为人们作出了指挥镇压行动的榜样；第二，领导地方组织和工作人员执行联共（布）中央和政治局下达的一个接一个的指示（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如8月15日和29日的指示，9月5日、13日和20日的指示，以及10月3日一天就下达的两个指示⁸。

让我们来看一看政治局这些决定中的第一个决定——8月15日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确定了总的原则，而且确定了所有后续指示的基调，从而也就确定了党和国家组织系统在农村的活动。这个决定不单单是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事实上决定是他亲自写成的，这一点可由1929年8月10日他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件来证明。这封信提出的基本要求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写进了决定的文字之中。“[……]如果我们真的想在十二月间结束收购，从而成为这次运动的胜利者”，——斯大林写道——那么就应该“立即给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达指示，要他们立即对城市中（同城市有联系的）的粮食投机商采取镇压措施（即逮捕他们并把他们押送出产粮地区），以便使粮食持有者现在就感觉到[……]，粮食只能规规矩矩地（而且是无损地）交售给国家和合作社机构”。“所有被查明与粮食收购人员竞争的”和“扣留余粮或把余粮卖给商人的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建议“立即解除其职务，并以欺骗国家和破坏罪交付法庭审判”⁹。自1929年秋天起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开始在农村粮食收购的行动中起主导的作用。国家暴力不可能不引起农民的反抗。有关1928—1929年农民的具体反抗行动的文件表明，农民的行动主要表现为抗议和对国家及其具体执行者的暴力进行自卫。尽管如此，政治局1929年10月3日通过了一个给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和各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专门指示。这个指示命令“采取坚决的迅速的镇压措施,直至枪决,以反对组织袭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的恐怖活动和其他反革命行动的富农[……]”,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如果要求特别迅速[……]可以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实施”,也就是说可以不经法庭的审判¹⁰。而以前通过的指示也保证了1929年秋天可以“对富农迅速采取镇压措施,直至枪决”。正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政治局准备的资料所说,到10月4日,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已经有“7 817人遭到镇压”,其中“富农约占百分之六十”¹¹。到11月4日被镇压的人数达到了28 344人,其中犯“经济罪”的15 536人,犯“反革命罪”的12 808人¹²。“加倍惩罚”和对“硬性任务者”——指那些接到提高了的交售粮食任务的人的惩治并不要求特别快地予以实行。1929年10月3日的指示的目标是农村即将面临的未来——“全盘集体化和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但是,新经济政策那时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早在十一月全会之前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就已经完全被抛弃了。

在苏联的历史文献中1928—1929年是作为“直接准备集体化的时期”而被突出出来的。对这一时期人们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因为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文件看,似乎“过火行为和歪曲”还未具有直接的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性质。虽然1928年春天曾试图加速组织集体农庄,但其结果在当时的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是受到批评的。可是党和国家机关日益卷入了强迫加速集体化的进程,不管当时技术和农艺发展的可能性如何,而主要的是——不管农民自己是否愿意联合到集体经济之中。

农村改革的最初计划设想不是很大的。1928年春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为俄罗斯联邦制订的计划草案预期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仅吸收110万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事实上1929年秋天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国家花费的资金在10亿卢布以上。就在1928年这一年的6月已经在谈论在俄罗斯联邦的范围内将有大约300万农户参加集体农庄。

但是就在这些计划批准之后,立即就开始修改,加快了集体化的期限。1929年6月25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合作社集体农庄运动领导机构在10月10日前“制订出保证在五年计划期间有85%以上的农户参加生产合作,以及把初级生产合作组织改造成大型集体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计划”。这样五年计划的生产合作化的任务就翻了一番。捉摸到中央情绪的地方领导人也开始重新修改集体化计划。与

此同时,1929年夏初也大致确定了解决富农命运的办法。7月18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工作的决议,决议写道:“中央赞同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关于吸收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是不合适的决定,以及必须系统进行工作以便把企图从内部腐蚀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清除出集体农庄。”¹³这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富农问题”,因为如何处理富农本人和他们的产业还不清楚。但是禁止吸收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几百万农民被送进“劳改营”的命运。

1929年夏秋的粮食收购和推行集体农庄工作之所以进行得特别残酷无情,不仅仅是由于有经济上的需要,并且也有它的政治上的原因。对斯大林来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证明所选定的方针是有效的,是能够扭转农村形势的。与此相反,困难的加剧会增加“右倾分子”的机会,会使斯大林多数派的领导成了问题。但是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并不仅仅寄希望于粮食收购的顺利进行(当时粮食收购的前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右倾分子”的特别措施。由于在党的机构中拥有绝对多数,斯大林集团从1929年5月起开始清党,在清党过程中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支持者纷纷从联共(布)组织中被驱逐了出去。在垄断了所有的舆论宣传工具之后,斯大林分子组织了反对“右倾”的群众性宣传运动。主要目标是“右倾分子”的首领——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他们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还保持着一一定的阵地,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威望。

尽管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从自己的岗位上撤了下来并被任命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担任次要的职务(相应地担任科技管理局局长和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主席),他们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此外,李可夫还占有最高国家岗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暂时还没有掌握在一段时间之后所掌握的全部权力,因而不得不相当小心地采取行动,准备逐步地把“右倾分子”清除出政治局,分几个阶段实行其清除计划。1929年11月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年7月——托姆斯基,一直到1930年12月——李可夫。每“清除”一个人都事先发动严厉的批评运动和制造一些挑衅事件。

1929年斯大林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布哈林。这一次批评布哈林的借口是他在全苏无神论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¹⁴和他发表的一篇文章《“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¹⁵。1929年7月8日政治局就此通过了下述决定:

“(1)认为布哈林同志在反宗教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撰写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文章是继续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反对党及其中央的斗争。

(2)建议《真理报》及其他党的机关报编辑部为执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最近一次联席全会的决议今后不得发表这一类文章和讲话”¹⁶。

1929年7月19日受斯大林的委托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散发了某个名叫Г.普拉托诺夫的共青团员的信件,布哈林在捷别尔达休息时曾经同他见过面并谈过话。后来布哈林自己曾坚决地说过,普拉托诺夫在这些信中“以歪曲的形式”叙述了他同布哈林有关党领导层内的斗争的谈话内容。这就使斯大林多数派得以发表声明说,布哈林“继续采取他近来选择的同党及其中央斗争的办法,对中央的决议在‘私人’谈话中从旁进行攻击:以前是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现在是同共青团员普拉托诺夫同志以及其他人的‘谈话’。”¹⁷

根据许多迹象判断,普拉托诺夫拜访布哈林以及后来的信件是专门组织的挑拨行为。布哈林自己在这件事情里,正像以前同Л. Б. 加米涅夫见面时一样,表现了自己不好的品质的一面。布哈林这一新的政治上的失误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沮丧。7月19日,也就是分发普拉托诺夫信件的那一天,托姆斯基写信给李可夫说:“在读了共青团员[……]给捷别尔达的智者的复信之后,感到‘愉快的’震惊!为什么叶菲姆卡(托姆斯基指的是布哈林的秘书叶·蔡特林。——编者注)不好好地看住他!这给我们的观众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印象。”¹⁸

但是在政治上破坏“右倾分子”信誉中占关键位置的是所谓的“工业学院事件”,或“沃罗比约夫事件”。

1929年9月19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学院党支部听取了支部委员В. И. 沃罗比约夫的报告。1928—1929年沃罗比约夫相当积极地同“右倾分子”保持接触,常去“右倾分子”领导人之一的莫斯科党组织书记H. A. 乌格拉诺夫家里,等等。但是他后来倒向了斯大林一边。沃罗比约夫报告了“右倾分子”在莫斯科组织里的“派别活动”,以及乌格拉诺夫和布哈林及其周围的人在他們同斯大林发生尖锐冲突期间的情绪和言论。沃罗比约夫的供词由工业学院党支部会议作了详细的速记记录,并把速记记录交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见补充材料4)。

对斯大林来说,“工业学院事件”的价值在于,这件事使他说“右倾分子”已经转向采取派别活动和非法斗争的方式,在自己的支持者中组织地下支部。这一次上演的仍然是1927年末对付左倾反对派(在他们被赶出党之前)的那个剧本,虽然其规模有所不同。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了一个自己的侦探,后来他又被宣布是“弗兰格尔白匪军官”,打进了反对派的一个组织,然后在他的帮助下捏造了一起关于反对派准备武装暴动的事件¹⁹。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关

于“工业学院事件”挑拨性质的说法。虽然政治局通过了决议要把从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得到的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²⁰,但是后来并没有发现审理“沃罗比约夫事件”的材料。而这个人后来的命运也是相当平安顺利的²¹。

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我读了工业学院支部的速记记录。看来得把问题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来。应该想到,布哈林将被从政治局开除出去。”²²虽然关于“工业学院事件”问题在十一月全会上并没有专门讨论,这一点可以从本卷所发表的速记记录中看出,但“沃罗比约夫事件”还是作为对“右倾分子”的指控之一提了出来,这也是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的一个理由。

上面所援引的斯大林的意见证明,关于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早在例行的中央全会之前就已经事先决定了。根据某些材料判断,斯大林在为对A. И. 李可夫作同样处理准备基础。斯大林选择了李可夫在莫斯科州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对他发动攻击的借口²³。就语调和内容而言这是仍然掌握着全部权力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讲话。对李可夫的讲话,据《真理报》报道,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斯大林对这篇讲话的发表反应非常强烈。1929年9月30日他从南方写信给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你们读过李可夫的讲话吗?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党的苏维埃官僚的讲话,装出一副‘忠诚’、‘同情’苏维埃的调子。没有一句话谈到党!没有一句话谈到右倾! [……]你们怎么能忍受(也就是说——包庇)这种政治伪善? [……]是不是应该使李可夫面临一种选择:或者公开地诚实地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或者剥夺他以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讲话的权利。”利用这次机会,斯大林要求剥夺李可夫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权利(这是从列宁开始的党的传统——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我得悉,每星期一和星期四李可夫继续在你们那里主持会议。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们让这样的喜剧上演呢?谁,为什么需要它呢?就不能结束这样的喜剧吗?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吗?”²⁴

莫洛托夫在复信中报告说,由于工作繁忙还没有来得及阅读李可夫的报告,并表示完全愿意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你的所有建议来得并不太迟并且应该予以实施”;“你可以相信,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放过李(可夫)和布(哈林)。不管他们使用什么孟什维克的欺诈手段,也不管他们在党的工作的某些方面的反党怠工,我们都会执行自己既定的一切”。²⁵

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谴责李可夫在自己的发言中回避了“同右倾倾向作斗争”的问题²⁶。这个决议没有涉及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问题,但是,根据所有的情况判断,这个问题已经在“工作程序”中得到了解决。斯大林对战友们的

行动感到满意,并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0月7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在建议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之后,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读过了政治局关于李可夫的决议。决议很正确!它,这个决议,当然也使我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关于这一点,等我回来后再谈。”²⁷斯大林对李可夫要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暂时还不清楚。不能排除早在1929年他已经考虑了把李可夫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并把他从政治局开除出去的可能性。

在准备联共(布)中央例行全会期间同李可夫发生的新的冲突,以及李可夫被排除在全会报告人之外,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作为政府首脑李可夫本来应该同国家计委主席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B. B. 古比雪夫一起就全会日程的第一个问题,即主要问题——关于1929—1930经济年度的控制数字作报告。1929年10月19日晚政治局收到了李可夫的报告提纲(实际上也就是全会的决议草案)。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保存有一份这个报告提纲,上面有斯大林的批注。根据文中批注的意见,以及在最后一页背面所写的几句话的片断可以判断,斯大林不满意提纲中没有提到粮食收购的成绩,没有提到农村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个别工业部门的强劲的增长。“[……]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已经被超过,已经变成了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最低方案”;“检查右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行动纲领 = 完全失败”,——斯大林写道。²⁸

毫不奇怪的是,10月20日在讨论李可夫的提纲时,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要在提纲里增加关于“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和谴责“右倾倾向”和“调和主义”等政治提法。李可夫拒绝修改文件,也就被剥夺了在全会上作报告的权利²⁹。

尽管斯大林很明显地希望摆脱李可夫,但仍然不得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容忍他留在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直到1930年12月。关于斯大林虽然坚决地,但又不能不谨慎小心地逐步实现他把“右倾分子”开除出政治局的原因,十一月全会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可以给我们一些概念。

关于控制数字的报告结束之后,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的全乌克兰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Г. И. 彼得罗夫斯基在谈到“右倾”时所用的语调,与其说是谴责的还不如说是调和的。他说:“我不再像当年那样是一个‘死抱住法规不放’的人,那时我们是同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同新的反对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斗争,以密集的队伍相互对垒,战斗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现在我们同右倾斗争则是另一回事,右倾对党内和党外都是危险的。事实上右倾的力量是微弱的。布哈林同志现在在座,我们应该公开地讲,

布哈林同志应该承认犯了右倾错误。他犯了很多错误,他推行了一条把我们的青年教授们引入歧途的路线,使父子两代不和(笑声。)”等等。(我们在括号中指出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的儿子 П. Г. 彼得罗夫斯基积极支持“右倾分子”,几年之后被镇压,死在监狱之中。)虽然随后的几位发言人使形势有所改变,他们不仅严厉地谴责了“右倾分子”,而且也批评了彼得罗夫斯基的软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看来,有某种根据可以期望从部分中央委员那里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拒绝悔过,并在 11 月 12 日晚上发表相当尖锐的声明,拒绝对他们右倾的指责,更不用说有什么反党的倾向,确认同斯大林多数派在有关工农业发展有脱节的危险,以及把采取“非常措施作为一项长期制度”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乌格拉诺夫的态度也引人注意,不顾别人的呼吁,他也没有在全会上匆忙地表示悔过。一切迹象表明,斯大林也感到了部分中央委员一定程度的克制态度。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之后——他在发言中尖锐地谴责了“三人集团”的新的声明,斯大林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谢尔戈!发言很好。这里的某些(许多)同志和你的想法一样,但不急于发言,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反对再‘稍稍地’躲一躲,害怕率先发言。你的发言的价值正在于此,它鼓舞了同志们,并给了他们所缺乏的勇气。这很好。科巴。”³⁰

事实也是如此,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之后,反对“右倾分子”的发言越来越激烈。可以不用怀疑的是,使“不急于发言的同志”受到鼓舞的不仅是奥尔忠尼启则,而且还有在全会幕后所做的积极的说服工作。这种说服工作有机会取得完全成功,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是作为胜利者来参加全会的。他们在党的机构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得以孤立政治局委员中的三人集团及其支持者。

十一月全会前夕,在《真理报》1929 年 11 月 7 日发表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周年的文章里,斯大林宣布即将过去的 1929 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坚决进攻”的一年,并号召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文章的基础是下列数字:1928—1929 经济年度对大工业的基建投资为 16 亿卢布(其中 13 亿是对重工业的投资);1929—1930 年度这方面的投资准备增加到 34 亿(其中 25 亿投向重工业);大工业的总产值相应地增加了 23% 和 32%,而重工业则增加了 30% 和 46%。国营农场生产的商品粮在 1928 年达到 3 600 万普特,集体农庄——2 000 万普特;1929 年这些指标已增加到 4 700 万和 7 800 万,而到 1930 年应该达到 1.1 亿和 3 亿普特,这就意味着,斯大林强调说,1930 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商品粮将占整个农业商品粮的

50%以上。

这些数字是把想达到的冒充为事实上已达到的。文章中关于中农开始参加集体农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开始的主要论点完全不符合现实。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到1929年10月1日只有7.6%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³¹。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支持者在全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教学参考书,“总路线”的拥护者都从这本教学参考书中寻找论据。

斯大林的文章决定了Г. Н. 卡明斯基《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的内容,就更不用说莫洛托夫1929年11月14—15日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上的发言了。莫洛托夫声称,1930年夏天“北高加索将实现集体化,而且不只是这一个州”,而是“我国的主要地区”;成功的粮食收购使我们得以建立“粮食储备”(“9.9亿普特的紧急备用粮”,也就是说超过一年所必需的粮食用量!);1930年春天“从组织方面我们将有一个对农业和对集体化特别有利的时期,这样的时期过去是不可能有的”。他以令人惊奇的激情高喊:“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投入播种运动,只有鬼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³²这句话在我们发表的正式速记记录中被删掉了。但这句话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大转变”的形势。大家知道,1930年春天党的“全部力量”不是被投入播种运动,而是被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和纠正“过火行为”。

全会上大多数发言都具有类似的激情——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必须更加扩大这些成就,执行既定的方针!关于日益增加的问题、矛盾和现行政策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发言中只是一带而过,似乎这只是暂时的,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困难。例如,由于急剧增加投资而在工业中收到的暂时效果,完全没有根据地被看成是长远的和经常的倾向。斯大林的支持者们常常引用的关于1928—1929经济年度工业产品增长的官方数字,大大地粉饰了现实状况,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比如,产品的质量大为下降了。斯大林初步提出,而后由十一月全会批准的1930年的不切实际的工业生产计划甚至就连形式上的百分比指标也没有达到。过度的疯狂的扩大基建工作战线,以及同这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投资效果的下降到1930年夏天已经使工业陷入了危机,这个危机在随后的一个时期里急剧加深,一直到放弃工业跃进的政策³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实施的斯大林式的工业化实际上造成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

这在更大的程度上涉及农村的形势,全会决议对农村形势的总的估计也是根据斯大林文章的精神作出的:“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向一些州提出了全盘集体

化的任务”。某些全会参加者所作的为数不多和不彻底的关于集体化的技术基础和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关于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集体农庄,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大规模屠宰牲畜的发言被淹没在总的乐观主义的合唱声中,引起的只能是愤怒。例如,C. B. 柯秀尔曾说道,在乌克兰犯了“数十次过火行为”:“我们有过几件事,整个整个村庄刚转成集体农庄,而后它们很快就垮台了,我们被打着鼓从那里赶了出来。我们在几十个村庄的土地上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而后来发现,这一切全是吹出来的,虚构出来的,居民没有参与此事,什么都不知道。”在С. И. 瑟尔佐夫发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插曲,当时他还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但很快就成了反对派)。瑟尔佐夫举了一些地方上的例子,特别是霍皮奥尔区——第一个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区的例子:“地方各个机关实行的是一套搞突击和搞运动的办法。全部组建集体农庄的工作都是在‘看谁建得多’的口号下进行的。地区的指示在地方上有时竟变成了‘谁不参加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没有进行广泛的群众工作。有这样的情况,村民集会通过决定建立集体农庄,却要求不愿参加的人上交一份专门的声明,说明为什么不愿意参加。也有慷慨许诺给拖拉机和贷款的情况。‘什么都会给的——来参加集体农庄吧’[……]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使集体化的程度,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69%^①,可能在我写信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0%。”瑟尔佐夫的发言被斯大林的插话:“您以为,一切都是可以‘预先组织’的吗?”打断了。

这一句意义重大的话结束了过去的时代,并标志着新方针的开始。而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带有市场关系的自发倾向,要求对合作化的发展作出“预先组织”,要求在农民从细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巨大的集体经济的道路上建造一整套的过渡阶梯。而有指挥的镇压体系的行动,即使它们能够直接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是不需要“预先组织”的。十一月中央全会正是按这样的原则通过决议的,这次全会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是可以在历史上最短的期限内完成的”。对工业部门跳跃式的增加投资和在农村强制推行集体农庄,这些在全会前已经开始的做法,获得了政治上的依据,并以新的力量继续执行下去。

十一月全会关于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和严厉警告李可夫及其他“没有同右倾分子划清界限,没有摒弃对右倾分子调和态度”的人的决议表明,“右倾分

^① 原文如此,但发言中说的是60%。——译者注